
政党文化视野下的红船精神：

生成·价值·内化

彭世杰¹

(浙江红船干部学院, 浙江 嘉兴 314050)

【摘要】: 红船精神是对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实践中表现出的独特精神品质的概括, 从政党文化这一新的视角来研究红船精神, 可以进一步挖掘其丰富内涵、发挥其内在价值。红船精神的生成发展是一个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过程, 经历了出场、诠释、升华三个阶段。作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船精神具备政党文化的一般价值, 特别是在回溯历史本源、凝聚党内共识、彰显政党形象方面的价值尤为显著。推进党员干部对红船精神的情感认同、理性认同、行为认同, 是实现红船精神内化、发挥其政党文化价值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 政党文化 红船精神 生成 价值 内化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3079(2022)02-0043-06

政党文化是政党价值观的外化形态, 是“一个政党所具有的为其党员所认同的意识形态、组织心理、制度规范和行为作风, 以及由此决定的一个政党区别于他党的政党形象”^[1]。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拥有丰富的政党文化, 而红船精神正是其中具有特殊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2005 年习近平同志第一次从理论层面对红船精神作出系统的文本阐述以来, 学术界从其提出、内涵、定位、逻辑理路、实践价值、传承弘扬等层面展开了多样化的理论诠释和实践探讨, 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基于政党文化这一新的角度来研究红船精神, 梳理其生成发展的历程, 分析其作为政党文化的独特价值, 探究其内化的路径, 不仅有助于从理论层面丰富、拓展、深化对红船精神的研究, 而且能从实践层面为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现实启示。同时, 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2]的伟大建党精神提出以后, 对同样基于中国共产党创建而提炼的两种精神之间关系进行探讨, 更加能够彰显红船精神的独立存在价值。

一、出场·诠释·升华：红船精神生成的三阶历程

从红船精神的形态来看, 作为历史存在(本体论)的红船精神和作为理论形态(认识论)的红船精神是存在“时差”的。作为一种历史存在, 红船精神产生于 100 年前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 但其作为一个理论概念被提出、真正被纳入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话语体系, 则是在 2005 年以后, 它经历了出场、诠释、升华三个阶段。而且, 红船精神的研究, 打开了建党时期党的精神研究的大门, 使我们党认识到在建党时期还有一种具有源头意义的精神, 从而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作了思想上、认识上、理论上的铺垫。

¹**作者简介:** 彭世杰(1982-), 男, 湖南平江人, 浙江红船干部学院、中共嘉兴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 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党的建设。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8BKS022)

(一) 出场：从历史存在到文本叙述的转换

从本体论的角度来讲，红船精神首先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它孕育产生于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中国先进分子寻求救亡图存道路的历史实践当中，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实践中表现出的精神、品质、作风、意志等的集中体现。作为一种历史存在，红船精神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时代主题而创建马克思主义新型政党的初心，以及在此历程中凝聚而成的一种不同于以往先进分子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特质，集中表现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3]。红船精神在历史上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政党文化需要话语的介入和作用才能将其丰富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观念传递至受众”^[4]。因此，作为客观历史存在的红船精神，需要转化为文本叙述，从而实现其作为政党文化的价值。从历史存在到文本叙述的转化，在红船精神作为政治话语出场的 21 世纪初叶有其现实的内在必要。从国内情况来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加之党面临的“四大危险”“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都迫切需要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从国际背景来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期，苏东剧变的深刻历史教训启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注重自我革命，时刻牢记建党初心，永葆党的先进性。同时，“党的精英和领导层有着十分强烈的党内教育的紧迫感和能动意识”^[5]。在 2005 年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红船所在地嘉兴市南湖顺应时代期望，组织开展了红船精神大讨论，并初步概括提炼了红船精神的表述词。此举受到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的高度关注，他在南湖红船精神大讨论的基础上，发表了奠定红船精神理论基石的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第一次从理论层面对红船精神的内涵、地位、价值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至此，红船精神实现了从历史存在到理论形态的概念置换与话语转换，正式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场域中。

(二) 诠释：地域精神还是政党精神的差异

《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一文发表后，嘉兴市将红船精神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资源，学习、研究、宣传、贯彻红船精神日益成为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船红中国、万众跟党走”成为嘉兴的一张城市名片。同时，学术界（党的十九大以前主要集中在嘉兴、浙江）也逐渐形成了研究红船精神的热潮。在 CNKI 中国知网上检索标题含有“红船精神”的论文，以 2005 年（习近平同志撰文首次系统阐述红船精神）为起点，以 2017 年（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南湖革命纪念馆后发表重要讲话再次论述红船精神）为终点，13 年间从篇数较少增加至 170 余篇，总体上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同时，在这十余年间，各级党委及其部门、学术界围绕红船精神组织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交流活动，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从多个维度对红船精神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析。其中，在涉及对红船精神的内涵理解和理论诠释方面，出现了将其作为地域精神还是政党精神的差异：一种是将其作为嘉兴（浙江）的一种地域精神，侧重强调“偶然转移、一条小船、半天会议”，突出红船精神的地域性；另一种则认为红船精神是“涵盖中共创建史整体时空所生发出的全局性、整体性精神”，而“不是对‘南湖会议精神’的简单重复”^[6]。事实上，习近平同志对红船精神的论述并非局限于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本身，其 5000 多字的署名文章中 8 次提到“诞生”，因而红船精神是围绕中国共产党诞生时期精神面貌的一种综合性、整体性概括。但是，一些人还是将红船精神理解成“半天会议”的精神。这种理解在某种程度上跟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命名方式有关，先于红船精神命名的革命精神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是以地域来命名的；红船精神是以红船来命名的，红船所在的地域为嘉兴，因而以红船来命名的革命精神——红船精神，就容易被理解成为红船所在地嘉兴的一种地域精神。当然，学术界的交流、交融和碰撞，客观上又推动了对红船精神的深入研究，这一阶段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红船精神研究成果，从而也为红船精神进入中央领导人的政治话语作好了理论准备。

(三) 升华：从多维阐述到政治话语的嬗变

党的十八大以后，全面从严治党日益向纵深推进，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回看走过的路”“永远保持建党时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红船精神无疑在这方面具有非常独特的教育价值，因而日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2017 年 10 月 31 日，党的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同志即率领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在这次集体“初心之旅”的总结讲话中，他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身份，重申了其 2005 年在浙江工作时概括的红船精神内涵，并强调“我们要结合时代特点大力弘扬‘红船精神’”^[7]。随后，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在内的官方

媒体集体重新刊发了习近平同志 2005 年发表的《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一文。同年 12 月 4 日，中央在嘉兴召开弘扬红船精神座谈会，王沪宁同志在会上从红船精神与建党精神的关系、与中国革命精神谱系的关系、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的关系三个层面论述红船精神的定位，表示红船精神“是激励我们党顽强奋斗、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动力，是我们党立党兴党、执政兴国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精神支撑”^[8]。以上一系列中央层面的行为，标志着红船精神正式进入中央领导人的政治话语，进一步提升了红船精神的社会影响力，带动和助推了对建党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深入、全面、系统研究，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奠定了基础。红船精神、伟大建党精神是习近平同志在不同时期围绕中国共产党创建而概括凝练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红船精神到伟大建党精神的跃升，体现出习近平同志理论认识上的不断丰富、深化、拓展、升华，也彰显了其高度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

二、溯源·凝聚·标识：红船精神价值的三维向度

政党文化的价值在于其自身对政党的意义，具有奠定政党思想基础、匡正党员干部行为、实现组织价值整合、增强党的执政基础、维护政党生存延续等方面的价值。当前，在伟大建党精神、红船精神两个概念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探讨红船精神的价值，首先，有必要厘清二者的内在关系。应该说，多年来红船精神的研究、宣传、阐释，实际上为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而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其是对红船精神的替代、否定、舍弃，红船精神依然具有独特的存在价值。红船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尽管在提出的时代背景、话语的表达方式、凝练的目的用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二者都是基于党的创建实践而概括提炼的，在内涵实质、价值主体、生成时间等方面是高度一致的。中共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求是》2021 年第 17 期发表的《党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一文，节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论述党的伟大精神 36 个段落，关于红船精神、伟大建党精神的论述均列其中。因此，二者尽管在内涵上高度一致，但是依然具有同时存在的必要。作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船精神不仅具备政党文化的一般价值，而且在回溯历史本源、凝聚党内共识、彰显政党形象方面的价值尤为显著。

（一）寻根与铸魂：红船精神之回溯历史本源的价值

中国文化中蕴含着寻根的文化基因。习近平同志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7]把红船与“梦想起航”“党的根脉”联系起来，可以说是对寻根文化的传承。历经百年革命、建设、改革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其建党历史及其在此历程中凝结的红船精神，在庆祝建党 100 周年的特殊历史时刻，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9]对于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创造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罕见奇迹的百年大党而言，弘扬建党时期形成的红船精神，有助于更加深刻认识百年大党创建的艰辛历程，特别是从本源的意义认识政党成立之时肩负的使命、秉持的宗旨、弘扬的理念。在全党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教育党的组织成员时刻铭记在红船上成立中国共产党时的建党初心和自觉肩负的救亡图存使命。在 2021 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同志在论述“百年初心”时又指出，“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10]。红船与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诞生、出征、百年初心等紧密相联，是具有源头意义的象征，而红船精神所体现的正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党历程中、起航出征时表现出的崇高精神以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建党初心，是“我们党创立时期坚持和实践自身先进性的一个历史明证”^[3]。红船精神借助红船这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物理承载和精神象征，以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叙事方式，表达出中国共产党从南湖红船起航的初始意象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在初创时期积淀的独特精神品质。因此，学习红船精神有助于党员干部深化对党的创建史特别是建党伟业中凝聚的精神力量的理解，构建起对中国共产党人创业形象的认知，找到自己思想和灵魂的根基，从而具有寻根和铸魂的重要意义。

（二）教育与引导：红船精神之凝聚党内共识的价值

政党是为了实现特定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整体，为了政党成员达到思想和行动方面的一致性，政党就需要采取一系列举措对其进行教育和引导，“使之确信采取与集体一致的步骤和做法是合理的、正义的、应该的，由此实现团体内部成员间的团结协作”。^[11]在政党长期发展中逐渐积淀的政党文化，无疑具备这样的功能。红船精神是建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信念、意志、品格等积淀而成的一种政党文化，其包含了勇立时代潮头、坚守理想信念、务实担当、先公后私等价值理念，而这些价值理念与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干部的一贯要求是完全契合的。尤其是在坚定理想信念方面，红船精神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他们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充满激情，甘愿放弃丰厚的物质生活、甘愿割舍亲情也无怨无悔的崇高道德品质”，“对共产主义的实现充满信心，将共产主义信仰内化成为自觉行动，甚至为此而付出生命代价的牺牲精神”^[12]。而对党员干部在坚定理想信念方面的要求，恰恰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的，无论是他提出的新时代好干部“二十字”标准，还是关于合格党员的“四讲四有”标准，理想信念的要求都是放在第一位的。因此，红船精神内在包含了一整套从党诞生之初就具备且在其发展历程中一贯坚持的价值理念体系，通过这套价值理念体系，有助于在全体党员中形成共同遵循的认识，从而凝聚起全体党员一致行动的思想基础。

(三)形塑与标识：红船精神之彰显政党形象的价值

区别于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革命精神以地域(如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事件(如长征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人物(如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方式进行命名，红船精神是以红船这一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事物来命名的。从红船的本义来讲，它代表的仅仅是一种事物；但从其政治寓意来讲，“红”象征着革命，代表着光明性、先进性，“船”的形象又与中国政治语境中的“风雨同舟”“载舟覆舟”等意境相符合，二者的有机结合，完整地形塑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为了群众、依靠群众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的初始形象。因此，红船“是‘名’与‘实’的统一”，“名实呼应、相生相成，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标识”^[13]。同时，从发展的角度来看，红船可以象征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历程中奋勇前行、开拓奋进的形象。习近平同志署名文章中诸如“红船劈波行”“扬起红船的风帆”“中国共产党人不管风吹浪打，不怕急流险滩”“高扬理想的风帆，荡起奋发的双桨，乘着改革开放的浪潮”^[14]等表述构建出的坚定者、奋进者、搏击者的形象，无疑都是建立在红船这一意境基础之上的。离开了红船这一载体，关于中国共产党扬帆起航、中流击水、逆水行舟等政治修辞就失去了依托。总而言之，红船这一符号不仅可以生动、直观地象征中国共产党诞生之时光明、积极、先进的形象，同时传递出党的为民初心、勇于开拓、坚定信念等文化观念，逐渐成为一个被党员干部群众深切认同的中国共产党的标识。红船的这种鲜明的标识性、意象性特征，具有其他形象或象征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且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因此，红船精神“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象征性表达”^[14]，这也更加彰显了其在伟大建党精神提出后独立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以红船这一形象标识来命名的红船精神，不仅可以传递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缔造建党伟业历程中表现出的精神面貌、价值追求、道德品质、人格操守等，同时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由风雨飘摇中的一叶小舟不断发展成长为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巍巍巨轮的标识性形象。

三、情感·理性·行为：红船精神内化的三重路径

作为政党文化的红船精神是由多维价值构成的“有意义的结构”，是一种潜在的“势能”，但这种“势能”只有进入主体的视野、通过主体的实践才能变成现实。因此，要真正发挥好红船精神的政党文化价值，就要通过有意识的政治教育、政治训练、政治实践等政治社会化形式，使其内化为党员干部内在稳定的精神结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

(一)认知与效仿：增强对红船精神的情感认同

列宁指出：“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真理的追求。”^[15]作为内化主体的党员干部，其对一种政治文化的认同，一般是从情感认同开始的。要促进红船精神的内化，首先要找到党员干部的情感依附点。中国共产党创建这一历史事件的展开，是以北大红楼、上海石库门、南湖红船等作为物质环境和实践场所的，同时，散落在民间的革命用品和建党先驱遗留的物品、后世为更好地传承红船精神而修建的纪念馆、展览馆等，都是红船精神的重要载体。因此，可以通过引导党员干部考察党的创建历程中保留下来的丰富历史遗存，阅读中共早期先进知识分子发表的文章，参观为纪念建党先驱而建立修缮的馆舍

故居等，增强党员干部对红船精神的感性认知。以建党时期遗留下来的革命文物为例，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建立共产主义信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到目前为止全国仅存 12 本，如果将这些珍贵革命文物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程、习近平同志在多个场合讲述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故事等素材有机结合起来，可以让受众更加全面、生动、深入地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体会早期共产党人为完成建党伟业、改造中国与世界忘我工作的精神状态。同时，榜样人物也对内化主体起着情感感化的作用，其先进事迹可引发内化主体的情感共鸣，并产生见贤思齐的仿效行为。因此，充分挖掘建党时期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望道等人寻求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社会底层民众奔走呼吁等方面的先进事迹，通过形象化的方式展示出来，可以触发内化主体对红船精神的情感认同。

(二) 教育与反思：增强对红船精神的理性认同

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政治文化的内化“是一个扬弃已有的价值观图式从而建构更高层次的价值观图式的过程”^[16]。这个改变的过程不会自动实现，需要加以有意识的教育和引导。这种教育和引导，就是政党通过一定方式向其成员主动灌输、宣传、渗透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文化品格并进而获得理性认同的动态过程。因此，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承担重要使命的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等，要通过系统化、多样化的课程，全面深入解读、宣传红船精神，帮助党员干部更好地认识红船精神，深化对红船精神的理性认识。如浙江省在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红船精神凝练升华之地——嘉兴建立的浙江红船干部学院，将打造“不忘初心的政治学院、红船精神的研究学院”作为首要办学目标，围绕红船精神的产生、内涵、定位、价值、传承等主题，系统开发了集讲授式、体验式、案例式、访谈式于一体的系列课程，全方位、多角度诠释红船精神，增强党员干部对红船精神的理性认同，进而实现从理性层面接受红船精神内隐的为事业尽责、为理想坚守、为人民谋利等价值理念。同时，红船精神在价值观层面的要求是一种理想的“自我”，相较之现实的“自我”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因此，在开展红船精神教育时，应当引导党员干部对一些深层次问题进行思考，如当年 13 位中共一大代表，一些人为何在后来的革命历程中走上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道路，这样的思考，可以启发党员干部充分认识到坚定的理想信念在个人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再引导党员干部反思自己与建党时期榜样人物之间存在的差距，对现实的“自我”进行剖析和调试，扬弃原有的与红船精神不相符合的价值观图式，努力促使其向理想的“自我”迈进，并逐渐实现理想的“自我”。

(三) 卷入与实践：增强对红船精神的行为认同

认同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行动卷入，使强调的价值观真正成为内化主体的自觉行动。促进红船精神的内化，使党员干部在工作、生活、实践中能真正做到不忘初心，传承好建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思想、行动中凝结的优良传统、价值理念、道德风范等。因此，在日常的党内政治生活中注入红船精神，发挥其对政党成员行为方式的规制和塑造作用，是传承好红船精神、促进红船精神内化的一种重要方式。政治仪式具有“强化人们对某一种精神、某一历史事件及其所处的历史地位和价值的深入理解，从而建构能够维系社会政治权力秩序的合法性基础，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社会协调发展进步”^[17]的功能，可以设计特定的政治仪式载体，如在重温入党誓词这一仪式化的活动中，将红船精神引入到一套具有象征性、教育性、文化性的修辞符码当中，通过引导党员干部重温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艰辛历程，唤醒党员干部对诞生于红船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集体记忆，达到增强政治认同的目的。另外，推动红船精神由政党文化向自觉行动的转化，要靠制度法规的权威来推动政党成员躬身践行。因此，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行为规范及其考核工作中，将体现红船精神的价值、理念、品格的一系列要求纳入其中，发挥制度法规的正向激励和反向惩戒功能，有助于党员干部自觉将红船精神作为其行为的内在尺度，内化为自觉的行为准则和行动规范。

参考文献：

[1] 赵理富. 政党文化探析[J].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02(5):9-14.

[2]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 年 7 月 1 日)[N]. 人民日报, 2021-07-02(2).

-
- [3] 习近平. 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N]. 光明日报, 2005-06-21 (3).
- [4] 潘娜娜.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话语权的建构[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5):140-151.
- [5] 赵理富. 政党的灵魂: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研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8:138.
- [6] 杨晓伟. 基于意象思维的“红船精神”命名中共建党精神的合理性[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7(6):23-33.
- [7] 习近平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强调铭记党的奋斗历程时刻不忘初心担当党的崇高使命矢志永远奋斗[N]. 人民日报, 2017-11-01 (1).
- [8] 王沪宁在弘扬“红船精神”座谈会上强调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大力学习弘扬“红船精神”用伟大精神推动伟大实践[N]. 人民日报, 2017-12-05 (1).
- [9]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 年 7 月 1 日)[N]. 人民日报, 2016-07-02 (2).
- [10]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一年新年贺词[N]. 人民日报, 2021-01-01 (2).
- [11] 杨光斌. 政治学导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79.
- [12] 彭世杰. 红船精神理想信念教育价值的内在逻辑、历史语境和实践路径[J]. 毛泽东思想研究, 2017(4):90-96.
- [13] 肖纯柏. 红船精神对中国文化的价值贡献[J] 观察与思考, 2020(7):83-87.
- [14] 刘建军. 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论解读[J]. 思想理论教育, 2021(8):12-17.
- [15] 列宁. 列宁全集: 第 25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117.
- [16] 陈立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的心理机制探讨[J]. 求索, 2012(4):190-192.
- [17] 王淑琴. 政治仪式推动政治认同的内在机理——兼论政治仪式的特征[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18(9):73-78.